# 习近平生态思想探析

刘海霞[1,2]，王宗礼[1]

（1.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2.兰州理工大学，甘肃　兰州　730050）

**摘　要**：面对日益恶化的全球生态环境和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日益显现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在续承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和谐的生态文明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厚道发展观；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制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法治观；以“生态红线”为生命线的生态安全观。梳理习近平的生态思想，对我们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生态民生；厚道发展；生态法治；生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5)3－029－033

DOI:10.13713/j.cnki.cssci.2015.03.006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检验一个社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直面我国社会主义生态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以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旨归而提出的以“生态文明观、生态民生观、厚道发展观、生态法治观、生态安全观”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思想观既有前瞻性、全局性，又有现实性，是深刻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晶。

## 一、习近平生态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来源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历史某一时期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以及对社会实践科学认识的结果。习近平生态思想的形成也不例外，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深厚的理论根基。

### 1.习近平生态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首先，习近平生态思想的产生离不开生态环境日渐恶化的国际背景。工业革命的高歌猛进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然而，与此相伴随的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剑拔弩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撞和冲突导致的生态破坏、资源短缺、能源匮乏、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粮食危机等把世界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恶化的生态环境如果不能尽快得以改善，任由人类继续恶化的话，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会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其“‘终极衰退’随时都可能来临”[1]，随时都可能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需要各个国家高度警惕。为此，各国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纷纷把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一项不可或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地区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冲突及其防控机制研究”(11CZZ027)、甘肃省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及其当代启示”(2014A－040)。

**作者简介**：刘海霞，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理论、生态政治学；王宗礼，法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理论、政治学。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施政纲领。正是这样的国际背景催生了习近平生态思想。

其次,习近平生态思想是基于破解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难题而提出的。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国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发展=经济增长=GDP增长”观念指导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迫使生态环境超负荷运转,引发了诸多问题:资源短缺、能源匮乏;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等环境污染层见叠出;土地荒漠化、植被破坏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破坏不可小觑。这些问题往往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一起,严重威胁人们生产生活、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安宁稳定。正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生态多元并茂、和谐发展的需要,习近平在不断反思我国社会主义生态实践中产生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思想。

2.习近平生态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

习近平生态思想不仅是破解国际国内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且有其深厚的理论根基,包括续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汲取人类文明史上的各种生态智慧。

首先,习近平生态思想续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人与自然休戚与共、同命相连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地阐释了人与自然休戚与共、同命相连的关系。一方面,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人是在大自然中孕育而生的,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2]63“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人首先依赖于自然”。[2]63“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3]同时,人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生产劳动使自然成为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人化自然”。人类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留一年,……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4]人类不断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他们不仅改变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5]另一方面,人类要如实地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一员,“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统治异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6]因此,人类开发改造自然的行为必须尊重自然“意愿”,爱惜自然“价值”,保证自然“健康”,顺应自然“规律”,否则,“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7]

其次,习近平生态思想汲取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各种生态智慧。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历代哲人先贤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关注,内在地积淀和凝聚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和辩证把握,饱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比如,人类早期对于神秘力量的敬畏所表露出的对自然之母“又爱又恨”、“又畏又惧”的神话自然观;古希腊以人为中心、主客二元分离的原始朴素自然观;中国古代儒家以天人合德为说的天、地、人并立并行的“三才”理论;道家“物我同一”的天人一体思想;佛家“法界缘起”、“依正不二”的整体自然观;伊斯兰教“真主创造万物,人是自然万物一分子,人与自然相依为命”等思想无不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和生态智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伴随日益显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勃兴的各种生态理论如生态自然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政治学理论、生态社会学理论、生态文化理论等都是习近平生态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

## 二、习近平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在续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础上,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战略高度,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丰富的生态思想。

1.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和谐的生态文明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有许多地方、许多领域为追求经济增长无情地导致和不可恢复性地损坏了环境和重要资源,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如果处于非理性的、不清醒的、无远见的状态,那么它对自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然的危害，迟早又会返还到人类自身，最终可能导致人类的灭绝和人类文明的崩溃。要免除由我们目前的活动过程可能招致的崩溃，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做出改变。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抓紧偿还生态欠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和谐，促进生态文明。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有目的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但是“大自然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而是一个需要我们精心保护的家园。”[8] 人类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的行为方式应该是理性的、合乎自然规律的。习近平本着对人类文明高度负责的态度，重申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性，他说：“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整体，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9]120 人与自然这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只有以一定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10] 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强。因此，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不仅要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而且要努力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只有这样，才能有力推动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正如习近平指出的，“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9]121 “生态文明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和想像力。”[11] 为此，习近平主张要在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12]211－212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

一直以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然而今天，因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导致的水污染、土壤污染、土地荒漠化、大气污染等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生态权益的生态民生问题已上升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这些突出问题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影响和损害，社会反映强烈，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不断增多。这说明，民众对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等的要求越来越高，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凸显，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而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9]123

民众对蓝天、白云、净水的热切期盼将生态民生摆上了格外重要的地位。而能否正确认识生态民生问题的重大影响并着力解决它，直接关系到执政党、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影响当代中国的政治进步、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并对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予以重大影响。习近平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十分关注生态民生，他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12]208 他要求加大环境治理和保护的力度，保障民众热切渴望的生态民生权益，并明确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保护生态环境，关系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关系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9]123 习近平在许多场合多次强调，必须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能源资源保障好，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给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厚道发展观

厚道发展是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扬弃，它是以人的幸福为目的，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经济、生态和社会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今天的生态环境问题，传统发展观难辞其咎。因为它提倡的“发展”本质上是不厚道的，表现为“对自然的不厚道（对自然的疯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狂榨取)、对他人的不厚道(贫富鸿沟的产生)、对后代的不厚道(严重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13]66这种不厚道的发展观的确使"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14]习近平意识到,要破解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就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他把二者比喻为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关系,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谈到环境保护时深情地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9]120这也正像他所指出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再也不能以GDP论英雄,要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环境损害程度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

习近平的厚道发展观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首先,经济发展离不开自然生态条件的支撑。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前提,经济的发展决不能破坏和牺牲自然生态条件。如果人类只顾发展经济漠视自然环境的保护,不仅会导致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还会招致自然的惩罚,经济可持续发展也会由于丧失自然基础的支撑而成为一句空话。其次,保护环境实质上就是发展经济,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不可偏废。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2]209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任何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长远发展的最大本钱。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严峻的现实告诫我们,片面发展经济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就会出现只有经济增长而生态遭受破坏的恶果,这是"竭泽而渔";过度否定经济发展而一味强调环境保护,就会陷入为保护而保护的窠臼之中,这是"缘木求鱼"。面对未来发展的重重压力,要坚持保护优先,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互利共赢,这种厚道发展观既体现当代人的切身利益,又关乎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

4.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制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法治观

蕾切尔·卡森说过:"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己使自己受害。"[15]3这说明,层见迭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表象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根子却是人与人关系的不和谐,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一定有深层次的体制性、制度性的原因。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大都与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法治不完备有关。因此,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就要从人与人关系密不可分的社会制度层面寻找突破口。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也提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制,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12]210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保障作了具体规定,"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12]210

法制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生态环境和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离不开法制。通过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力、强制力和溯及力,有效处理经济、社会生态之间的复杂关系。用最严密的法制保护环境,具体来讲,首先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安排,即以《环境保护法为重点》,完善资源、生态和环境相关法律法规。抓紧修订与完善环境专项法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抓紧开展土壤环境保护、环境税、核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立法工作,尽快弥补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立法空白。其次,要将符合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时代要求的法律思想、法律观念、法律价值取向融入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社会法等相关法律,推进这些法律的"生态化"。除了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推动各项法律"生态化",最为重要的就是"治本",这个"本"就是采取各种措施唤醒全民生态法律意识,并使生态法律意识深入人心,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自觉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己任,凝聚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正能量。正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给《寂静的春天》写序时深刻指出的,"环保意识的迅速觉醒是最具根本性的。一个正确思想的力量远远超过许多政治家的言辞。"[15]5

5.以"生态红线"为生命线的生态安全观

牛津大学教授诺曼·梅尔斯曾在《环境与安全》一书中指出:"生态完整是国家安全的核心",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它作为自然安全的“纬线”，串起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的“经线”，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盛衰兴旺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全方位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同时，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了生态与生存的切肤之痛。尽管这些年来我们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不能不看到，由生态问题引发的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冲突和矛盾日益增多，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和影响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生态安全依然是高悬在国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13]219

生态安全是一切安全的基石。没有生态安全，军事、政治、经济等的安全也就无从谈起。为保障生态安全，我国设定了 18 亿亩“耕地红线”、37.4 亿亩“森林红线”、8 亿亩“湿地红线”，这些“生态红线”的设立，其实就是生态危机逼近的“临界点”。习近平强调，保障生态安全，首当其冲要严守一个个“生态红线”。“生态红线，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这个红线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必将危及生态安全、人民生产生活和国家可持续发展。”[9]126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12]209 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非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不可，不然不仅生态环境恶化的总态势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而且我们设想的其他生态环境发展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要精心研究和论证，究竟哪些要列入生态红线，如何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把良好生态系统尽可能保护起来。对于生态红线全党全国要一体遵行，决不能逾越。”[9]127

## 三、小结

习近平生态思想是深刻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产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理论上，习近平的生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形成的又一理论成果，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实践上，习近平生态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是新时期我国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强大思想保证，对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1](美)莱斯特·R·布朗.崩溃边缘的世界—如何拯救我们的生态和经济系统[M].林自新，胡晓梅，李康民.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1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73—37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0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8]孙民.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理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探微[J].兰州学刊，2014(6)：26－33.

[9]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4.

[11]蔺雪春.生态文明辨析：与工业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评较[J].兰州学刊，2014(10)：81－85.

[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3]陈宗兴.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卷[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

[14](波)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M].徐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93.

[15](美)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黄旭东]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